

脱下军装,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贵州“兵支书”脱贫攻坚一线显身手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平元村风貌(8月4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贵州省,近年来选拔优秀退役军人在村居“两委”中担任支书、主任、委员,培养出一批摆脱贫困的山村“领头雁”。

当地统称这些村干部为“兵支书”。他们“打法”多样,带领群众攻克脱贫战场上一个个“堡垒”,走向小康的难点逐一消除。

1 换个身姿奔赴“战场”

非黄黄,夏收忙。

在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成片的韭黄茼白如玉、叶黄如金、色泽诱人、长势正旺。村民们将成熟的韭黄从根部割起,送到分拣中心清洗和包装,随后通过冷藏车发往广东、上海、浙江等地。

皮肤黝黑、声音洪亮的村党支部书记杨守亮正带领村民采收韭黄。他说,现在带韭韭黄每斤卖2元,亩产6000斤,农户种植1亩就有1.2万元的毛收入。经过村级公司清洗、包装的韭黄,每斤能卖到6元。

而在几年前,这里的情况可大不一样。虽然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旗韭黄”的发源地,但韭黄种植分散、规模小,大部分农户种植玉米,户均年收入不足万元,全村6373人中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645人,贫困发生率达25.8%。

当兵4年退伍后,杨守亮做起了蔬菜生意,从云南、广西、湖南等地拉蔬菜到本地售卖。在多年摸爬滚打中,他摸到了韭黄村脱贫致富的“门道”。2016年担任村支书,他向村民承诺:“擦亮‘白旗韭黄’招牌,带领大家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脱贫攻坚也是‘战场’,一定要打胜仗!”

首先是修路,货车进得来,韭黄才运得出。进村泥路坑洼不平,杨守亮四处奔波、申报项目,终于打通一条像样的产业路。

部分村民不愿种韭黄,杨守亮将全村74名退伍老兵组织起来,以老班长带新兵的方式组成多个班组,讲解政策、流转土地、协调资金,成立村级公司产生示范效应。

为打开韭黄销路,杨守亮组建32人的销售“尖刀排”,走南闯北找市场,与广东、上海多家农贸市场和大型商超建立长期销售关系。

如今,6000余亩韭黄年产量4200吨,已成为全村脱贫的重要支撑。2019年,韭黄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1.6万元。3年时间让贫困村成为先进村,杨守亮获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这个季节,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关镇宜所村的“兵支书”杨兵和杨守亮一样繁忙。他组织村民采收茄子、装车外运,“村里现种植蔬菜1200多亩,这些天每天都要发出十几吨蔬菜”。

2001年从部队退役,杨兵打过工、种过菜。成为“兵支书”后,他全力在村里推进茄子、黄瓜、无筋豆、生姜等种植。“这几种蔬菜能够轮番上市,特别是长茄可从5月采摘到年底,贫困户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村民一年四季都有收入。”他说。

目前,宜所村已经脱贫出列,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增加到2019年的1万余元。

换个身姿再领使命,退役军人奔赴新“战场”。记者从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了解到,近年来,结合脱贫攻坚工作需要,贵州省相继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若干措施》和《关于在优秀退役军人中选树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选拔培育了9116名优秀退役军人成为“兵支书”,带领群众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白岩镇韭黄村党支部书记杨守亮(右一)同农户交流(8月3日摄)。

■新华社发

2 铁的纪律挺在“战场”

2016年,退伍军人肖正强当选安顺市平坝区白云镇平元村党支部书记。想要干事创业,摆在他面前的头个“拦路虎”就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经过走访调查,我发现村民对一些村干部意见很大,干群关系比较紧张。”肖正强说,那时候村支“两委”作风涣散,群众办事经常找不到人。

在征得镇党委同意后,通过考察,群众推荐,3个不称职的干部被换掉,新的村支“两委”干部平均年龄38岁,充满活力。

肖正强表示,从干部的作风问题入手,是受自己当兵经历的启发。在部队,农村出身的肖正强吃得了苦,受得了累,勤奋好学,多次荣获嘉奖。“部队有铁的纪律,必须令行禁止。现在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把纪律挺在前面怎么行?”他说。

借鉴了部队的管理制度,肖正强在村支“两委”定下“规矩”: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要向支部请假;每周和周五必须召开例会,在会上大家共同学习理论政策、实用科技和市场经济知识。

同时,平元村还专门制定了干部评价表,邀请群众为干部打分,严格奖优罚劣。

如今平元村良好的风气已成为其他村学习的榜样。“老百姓上门办事一定能找到人,并且随叫随办,干群关系很融洽。”肖正强说,2018年以来,平元村村民对村支“两委”的满意度测评均超过90分。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海子街镇五十亩村,铁的纪律也是脱贫攻坚“战场”的制胜法宝。2015年,从部队退伍的李刚担任五十亩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有的村干部作风不好,存在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现象,村党支部涣散,已经多年没有发展过党员”。

为了消除沉疴,李刚一手抓党建,一手抓作风,先后发展了10多名党员,将组织生活有序化、常态化。建章立制规定村里主要事务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尤其是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低保救助等不能由村干部个人说了算。他认为,当兵学到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在基层治理中非常有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基层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

今年38岁的铜仁市石阡县坪山乡凤凰屯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天强在部队曾3次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如今他是当地的致富带头人。2003年退伍回乡后,他花光所有积蓄,承包土地种植茶叶。凭着一股子冲劲,他买书自学,参加培训,逐步将茶园面积扩展到400多亩,年产值100多万元。

“富裕不能忘记穷亲戚。”他说,村里还有不少贫困户,自己富裕了也应该帮他们一把。他把种茶和制茶技术教给贫困户,支持30多户村民种茶制茶,很多人成为种茶大户。

(新华社贵阳8月9日电)

3 多样打法决胜“战场”

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潘科说,活跃在贵州脱贫攻坚一线的“兵支书”经过部队多年培养教育,不但思想政治素质过硬,而且头脑灵活,敢试敢闯。他们“打法”多样,因地制宜带头发展养殖、种植、旅游业等,将一个个贫困村变成“小康村”。

2012年,有8年兵龄的退役军人陈斌回到家乡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2016年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在当地群众的眼里,陈斌是一位“能跑”的“兵支书”。

跑人畜饮水、产业路、危房改造等项目,“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问题解决”;跑养鸡场、蔬菜基地项目,25万羽规模的蛋鸡养殖场现在每天产蛋量达23万多枚,1200多亩蔬菜基地解决了200户贫困户就业问题;跑学生家劝返辍学儿童,全社区大学生从2012年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人,辍学现象完全消失。

仲夏时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

清除“疙疙瘩瘩” 织密服务“针脚”

——浙江创新延伸治理新路径

小到村头菜市场的建设,大到一座城市的精密运转,背后都是一篇治理的文章。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浙江以科技驱动创新“最多跑一地”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用法治思维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疙疙瘩瘩”,将平安作为高水平发展的底线,延伸出构建和谐平安社会的新路径。

化群众智慧为群治力量

在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28位女企业家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当地纠纷调解的金名片。发起人徐维丽来自辽宁省海城市,2003年来到织里镇经营童装,把织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2017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负责人跑路引发集体讨薪,多亏“平安大姐”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确保了工人们回家过年。“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口袋富了,总想着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徐维丽说。

“平安大姐”工作室只是浙江推进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建设的一个缩影,在浙江,依靠群众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共识。浙江全省社会组织从2007年的2.4万个增加到2018年的5.5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位居全国前列。

40年的发展让毛衫成为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的富民产业,也让这个小镇成为南来北往的集散地。“小时候家里住的是草棚,现在社区家家户户住新房。”55岁的横泾桥社区党总支书记黄水跃说。

和腰包一样鼓起来的还有人口,目前横泾桥社区户籍人口2611人,而外来人口超过1.2万人,给社区治理带来新挑战。“这几年持续推进新居民党建工作,实现微网格的精细化管理。”黄水跃说,基层治理需要依靠老百姓的智慧,在法律的框框内加强自治。

把小微权力关进“笼子”

一个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的农村菜市场,却因村民认为村干部“有利可图”而搁置。在宁波市宁海县,这场乡村治理风波最终因《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出台而化解。

宁海县桃源街道下桥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里的老菜场较为简陋,已难满足群众的日常需要。2012年,村班子经过调研摸底决定建一座新菜场,但很多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表示反对。“当时有传言说村干部想借机赚

钱,村民代表就不同意。”村民王万永说。

12次村民代表大会开下来,菜市场建设工程始终没能通过。宁海县纪委监委葛知宙表示,过去因为村级权力没人监督,老百姓对项目具体操作过程不知情,就容易引起这种不信任。

针对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宁海2014年探索实施了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为小微权力运行建章立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下桥村按照“36条”规定,通过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群众评议等规范性操作,得到村民认可。当年,桃源菜市场顺利建成并招租出租,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2018年,沾着泥土气的“宁海经验”写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决定》。这份决定提出,实现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村(居)全覆盖,防止基层“微腐败”,促进乡村治理。

让城市运转“耳聪目明”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门口一行标语颇为醒目——找个说法、想个办法、解难“最多跑一地”。“老百姓碰到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个办法解决问题。”负责人李国女说,中心已基本实现部门“应入尽入”。

综合信息指挥室大屏幕上,各类数据流交汇显示,为中心运行提供大数据支撑。截至6月底,该中心共登记群众来访1681件,分流至信访、公安、各类调解组织等渠道。

通过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浙江形成了县(区、市)、镇街、村社三级联动的金字塔形矛盾化解模式。2019年,该省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0.4%,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

不仅矛盾调解“耳聪目明”,城市治理也心中有“数”。从“数字治堵”“数字治城”到“数字治疫”,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有效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

“市民可以更好地触摸城市脉搏、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城市管理者也可以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决策,提高城市治理效能。”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技术总架构师王坚说。

据统计,杭州城市大脑目前包括公共交通、卫生健康、基层治理等11大系统,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1.2亿条。

(新华社杭州8月9日电)

“下单10秒钟 多睡10分钟”

——上海电商新角色“花式”宠爱市民生活

摊面糊、打鸡蛋、撒葱花……早上8点,在上海地铁13号线世博会博物馆地铁站附近的一家盒小马,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紧张熟练地制作煎饼果子等早餐餐品。制作完成后,他们会将煎饼果子放入旁边的取餐柜。

与此同时,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吴尧强已经下地铁,并在手机APP完成下单。来到取餐柜,扫描二维码,就拿到了自己的早饭。“早上时间比较紧张,以前经常不吃早饭,现在可以方便快捷地解决早饭。”

煎饼果子、手抓饼、豆浆、粥、咖啡、可颂面包……别看占地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但盒小马提供的中西式餐品超过40种。

经过互联网加持的早餐,不仅丰富,而且快捷。130秒,这是从煎饼果子制作完成到被顾客取走的平均时间。“让白领多睡10分钟,还可以解决买早餐排队的问题。”上海盒马网络科技副总裁沈丽说,相关调研显示,上海有约三分之一白领不吃早饭,盒小马早餐点解决了时间紧张这一痛点,又保证了食品品质。“下单10秒钟,多睡10分钟”,据悉盒马将在上海推广这一早餐点模式。

“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有品质的早餐是其中一个小目标。早在2011年,上海就被商务部列为“全国早餐示范工程试点城市”,市政府更连续7年将“早餐工程”列入实事项目。截至目前,24家中餐厨房直接配送1800个早餐网点,间接配送6000个早餐网点,由工厂化、标准化的中央厨房生产的“放心早餐”已占全市早餐供应50%以上。

近年来,在上海崛起了一批以盒马、叮咚、拼多多为代表的在线经济新力量,在助力脱贫攻坚、提升城市居民品质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电商加持下的“云农业”加速发展,一端为市民提供更便宜新鲜的农产品,另一端让山区的优质产品加速进入城市餐桌,化解交通不便、农产品滞销等问题。

上海土生土长的电商“新角色”拼多多平台,通过“拼”的模式聚集海量需求,将数千万农户的供给和数亿用户的需求进行精准匹配,从而突破中国农业分散化的制约,让农产品供给在“云端”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过去一部手机的预算,在拼多多平台可以买齐手机、降噪耳机,甚至再加一个充电宝;原来买一斤荔枝的支出,现在可以买一斤荔枝、一斤梨,再加半斤砂糖橘。

如今,新角色电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一枚大樱桃从果园的“枝尖”到千里之外消费者的“舌尖”,仅需8个小时;一扎鲜花从云南花圃的“土中”到沿海城市居民的“家中”,仅需12小时;一个哈密瓜从新疆“瓜田”到上海阿姨们的“手里”,仅需48个小时。

近年来,生活服务领域成为上海电子商务增长的重要引擎,呈现多点爆发态势。在餐饮外卖、生鲜食品、酒店旅游、休闲娱乐、在线教育、家政服务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正在赋能更美好的品质生活。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岚说,上海将继续发挥电商平台在消费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发挥上海作为零售创新“试验田”和“竞技场”的优势,围绕线上赋能线下、线下拥抱线上,推动实体商业数字化渗透、传统电商社交化转型、内容平台电商化拓展、生活服务平台智能化升级,打响上海“云购物”品牌。

(新华社上海8月8日电)